

《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

——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郭 焮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30)

摘 要: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关键词:苏轼;《三苏先生文粹》;《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韩愈优于扬雄》;二程;《东莱标注三苏文集》;吕祖谦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5-0072-06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508

苏轼一生著述因富,作品极多,又因宋徽宗时期屡禁其文字,南宋之后又影响极大^[1],以至于苏轼文集的版本系统颇为复杂,其中也涌入不少他人之文。粟品孝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华书局标点本《苏轼文集》卷六五《史评》所收《历代世变》一文并非苏轼作品^{[2]2040}。该文与《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所录程颐的一段史论基本相同^{[3]236},且经润色加工后收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政》之中^{[3]1212-1213}。所谓《历代世变》一文,实际上应是根据程颐的言论进行简单改编而成^[4]。受此启发,笔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注意到,《史评》中并非苏轼作品的尚不止《历代世变》一文,其外《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2]2034-2035}一文,以及《韩愈优于扬雄》^{[2]2035}一文,应该也都不是苏轼所作。笔者于此尽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

与《历代世变》相似,《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和《韩愈优于扬雄》这两篇文字的流传也较为广泛,当代一些苏轼文集的选本也都选录了两文,尤其《韩愈优于扬雄》一文曾收入一度影响很大的类书《历代名贤确论》卷八八和《唐宋名贤确论》卷九,且均系之苏轼。又因为该文涉及对扬雄、韩愈的评价以及对文、道观念的阐述,不时为学者所引用,如流传很广的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便在《原道》题注中以

收稿日期:2020-10-30

作者简介:郭焮(1982—),男,四川合江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宋代思想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唐宋道统论研究”(16CZS031)。

“东坡曰”的形式节引了该文^{[5]13},曾枣庄先生《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附录·三苏文艺评论资料集成》^{[6]436}也收录了该文,也有其它一些研究苏轼的学术著作引及该文,诸如李放的《苏轼书法思想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以及许外芳的《论苏轼的艺术哲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苏轼文集中《史评》收入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兹录全文如下:

昔袁盎论绛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汉之称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萧望之之流。三人者,非有长才也。勃以重厚安刘氏,黯以忠义弭淮南之谋,望之确然不夺于恭、显,孔子所谓大臣以道事君者耶?仆尝谓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断一指与一足,未及于死也。腹心之病,则为膏肓,不可为也。李靖、李勣可谓功臣,终始为唐之元勋也。然其所为,止卫、霍、韩、彭之流尔。疆场之事,夷狄内侮,能以少击众,使敌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余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几,此两人者,盖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丽,靖已老矣,而自请将兵,以坚太宗黜武之志,几成不戢自焚之祸。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无问外人,武氏之祸,戮及襁褓,唐室不绝如线。则二人者,为腹心之病大矣。张释之戒啬夫之辨,使文帝终身为长者。魏元成折封伦之论,使太宗不失行仁义。孔子所谓有“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岂其然乎?^{[2]2034-2035}

此文主体亦见于今本苏轼之子苏过《斜川集》卷六,题为《书二李传后》。为方便比对,亦录之如下:

昔袁盎论绛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臣之辨,不可不察也。淮南王安反,谓大将军可刺,说丞相如发蒙耳,而独惮一汲黯仗节死义,其与社稷存亡也,审矣!愚尝谓社稷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断一股、折一足未及死也,心腹之病则为膏肓,不可救已。李靖、李勣可谓功臣始终,唐之元勋也;而太宗付属委托,亦已重矣,然止将帅之材耳。疆场之事,任之则有余;社稷之寄,安危之机,则两人者,有折足渥形之败矣。太宗欲伐高丽,谏者十六七;靖已老矣,而自请将兵,遂坚太宗黜武之志,几为不戢自焚之祸。高宗欲立武后,举朝为之寒心,而勣以为陛下家事,无问外人。武氏之祸,戮及襁褓,唐室不绝如线。夫二人者,为腹心之病亦大矣!张释之谏啬夫之拜,使文帝终身为长者;魏元成折封伦之论,使太宗不失行仁义。语曰:“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豈其然乎!^{[7]513-514}

两相比较可见,虽然两文主体大致相同,但是,显然《斜川集·书二李传后》文理更为优畅,而苏轼文集中《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则颇为不通。《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不仅缺少了《斜川集·书二李传后》“谏者十六七”“举朝为之寒心”这样的关键句子,而且文意颇有自相矛盾之处。

其一,文末所举张释之、魏徵(字玄成)之典,分别见《史记》卷一〇二《张释之列传》和《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汉文帝时,“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因而诏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反对“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汉文帝从之。唐太宗贞观前期,因国家元气渐复,唐太宗有骄满之意,魏徵因而劝行王道政治,封伦(字德彝)认为这是乱国虚论,魏徵雄辩反驳,封伦心虽不服而口不能对。后来国家大治,唐太宗谓群臣曰:“此徵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张释之阻滞口辩小人,魏徵则以雄辩引导唐太宗行仁义,都是为了与李靖、李勣的反面例子形成鲜明对比,正是要印证《论语·子路》中“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的警诫。《斜川集·书二李传后》“豈其然乎”(即“信其然乎”)的结语,就是要加强这一判断。然而,《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的结语却作“岂其然乎”,完全违背前文的用意。并且,《斜川集·书二李传后》引文时作“《语》曰:‘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更为准确。《论语·子路》:“(鲁)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而《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则作“孔子所谓有‘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多出“可以”两字,则更接近鲁定公之语而非孔子之语。

其二,《斜川集·书二李传后》论及西汉社稷之臣仅举汲黯一人;《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则并称绛侯周勃与汲黯、萧望之一样为社稷之臣,而文首又依据《史记·袁盎列传》称周勃只是“功臣”,

而“非社稷臣”，前后文理自相矛盾，可见本文不可能出自苏轼这样文章大家的手笔。

要之，《斜川集·书二李传后》《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二文存在着因袭关系，前者应是更原始也更优的版本，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修改者对原文的用典、文意似懂非懂，因而造成了一个不太成功的新版本，这与后文将要讨论的《韩愈优于扬雄》一文的情况非常类似。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苏过《斜川集》在明代已渐失传，今本《斜川集》系清人从《永乐大典》中陆续辑出而成，总体上应比较可靠。虽然不能排除清人误辑苏轼之作为苏过作品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应该很小。而即便是清人误辑，《史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的内容也绝非原始版本，这离苏轼的水准颇远。此外，今本《斜川集》卷六除《书二李传后》外，另有《书张骞传后》《书周亚夫传后》《书田布传后》诸文，虽然这些题名可能是清人辑佚时所加，但似乎在原《斜川集》中，这些评论史传的文字应当是一个系列的作品。等等这些，都更倾向于证明该文本应属之苏过而非苏轼。

二、《韩愈优于扬雄》

除《历代世变》和《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两文外，《韩愈优于扬雄》一文也应该不是苏轼的作品。《河南程氏遗书》卷一有一段记录与《韩愈优于扬雄》的内容基本相同，仅文字上有小出入，录之如下：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至如断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杨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杨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3]5}

《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为《端伯传说》，即二程早期的亲密弟子李吁所记二程语录。程颐在其祭李吁之文中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绚）为有力焉……予谓二子可以大受，期之远到，而半年之间，相继以亡，使予忧事道者鲜，悲传学之难。呜呼，天于斯文，何其艰哉！”^{[3]643}朱熹编辑《伊洛渊源录》收录了程颐悼念李吁的两篇祭文，并说李吁“尝记二先生语一编，号‘师说’，伊川称之。而《祭文》亦有传学之语，盖自刘博士（绚）外，他人无此语”^{[8]第12册，1026}。可见李吁在程门的重要地位。在《伊洛渊源录》李吁遗事中，朱熹又记程颐语云：“旧尝令学者不要如此编录，才听得转动便别。旧见只有李吁本无错，他人多只依说时，不敢改动，或脱忘一两字，便大别。李吁却得其意，不拘言语，往往录得都是。”^{[8]第12册，1028}朱熹在编辑整理《河南程氏遗书》时又云：“伊川先生曰：‘《语录》，只有李吁得其意，不拘言语，无错编者。’故今以为首篇。”^{[3]1}可见李吁所记最为程颐和朱熹所肯定，其内容的可靠性应是相当高的。并且，就文风来看，这段文字虽经李吁“不拘言语”地梳理过，但其中仍然带有口语的痕迹，而与苏轼的文风大不相类。

苏轼文集中《史评》收入的《韩愈优于扬雄》一文，与上引二程之语大体相同，文云：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观其断曰：“孟子醇乎醇；荀、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他有见识，岂千余年后便断得如此分明。如扬雄谓老子之言道德，则有取焉；至于如槌提仁义，绝灭礼乐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为救时反本”之言无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道德则有取。杨子亦自不见此，其与韩愈相去远矣。^{[2]2035}

较之《遗书》该段文字，其刻意加工润色的痕迹相当明显，主要是以文学语言修改《遗书》中接近口语的文字，以使其看起来更像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然而，对读这两篇文字，实则《遗书》所记更为条畅，《韩愈优于扬雄》反而不时迟滞不通，如《遗书》云：“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

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而《韩愈优于扬雄》则云:“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古人,自亦难得。”这虽然看似润色修饰过了,实则还不如《遗书》原文条畅。可见将《遗书》文字修改为《韩愈优于扬雄》者的文学水平并不太高,与苏轼的水准更是相差极远。此外,就思想特点来看,这段文字主要肯定韩愈《原道》以孟子继承道统的判断,以及批判扬雄夹杂黄老,这都与二程的思想倾向一致,但苏轼则既不太重视道统论,也不完全肯定孟子,其《子思论》批评孟、荀、扬人性论之争“起于孟子”^{[3]95},《论语说》则更“与孟子辨者八”^{[9]55},而且苏轼好佛老,并不像二程那样积极排斥异端。总之,这段评论韩愈、扬雄的文字应当属之二程无疑,只不过到底是程颢还是程颐所云则待博识者详辨。

粟品孝先生也曾指出,就现存文献看,最早将《历代世变》收入苏轼文集之中的应是《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者。今存《三苏先生文粹》有100卷和70卷两种版本,前者将三苏文字分类辑文^{[10]第137-139册},后者则依人系文^[11],两种版本也都收录了上述《历代世变》《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和《韩愈优于扬雄》这三篇文字。七十卷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一二至四三为苏轼文字,卷三十九《迩英进读》8条之后为《评史》12条,卷四〇续以《评史》34条,其后是《评文选》4条,卷四一为《杂说》11条。卷四〇《评史》34条中,《历代世变》居首,《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在第31条,《韩愈优于扬雄》在第33条。在一百卷本《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中,卷八八为《杂说十首》和《迩英进读八首》,卷八九为《评史三十四首》和《评文选四首》。从《迩英进读》《评史》《评文选》《杂说》这几个部分的内容和排列顺序来看,虽然在条目上有些微出入,但两种版本《文粹》的底本来源应该较为一致。而这几个部分中,两种版本差别最大的就是《评史》。七十卷本《文粹》卷三九的《评史》12条,在一百卷本中全都以“说”散附于“论”的诸卷,而七十卷本卷四〇续《评史》34条与一百卷本《文粹》卷八九《评史三十四首》仅有两条出入,其余诸条则顺序相同。后者多了《五星聚东井》和《卫瓘欲废太子》2条,但少了《扬雄言许由》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条,少去的两条则均以“说”见于卷十四《圣贤(说二首附)》,而《韩愈优于扬雄说(附)》收在卷末,排在苏轼《韩愈论》之后。

此外,《史评》在收入《三苏先生文粹》之前似乎曾独立成书过。虽然苏辙《苏轼墓志铭》和《宋史·苏轼传》均未提及此书,诸家目录书也未曾提及过苏轼《评史》,但程颐弟子尹焞曾说:“如世传《史评》之类,皆非先生(程颐)所著。”^{[12]第32册,33}尹焞所云附会程颐的《史评》一书很可能就是收入《三苏先生文粹》的《评史》,而该书大概起初本为汇编一些评论历史的文字以供科举之用,因而并不在意著作权归属为谁,更不是为了刻意编辑苏轼或二程的史论文字,因此,后来便有人曾因其中有程颐的言语而将其属之程颐,而《三苏先生文粹》的编辑者则因其中有苏轼的文字而干脆将其一并收录。

三、《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东莱标注东坡先生文集》卷二三、二四与七十卷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三九、四〇虽小有出入,但内容和顺序大体相同,《历代世变》^{[13]第11册,449-450}《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13]第11册,467-468}《韩愈优于扬雄》诸文同样也在其中^{[13]第11册,468-469}。关于《东莱标注三苏文集》是否为吕祖谦所编选,学界有所争议。《宝礼堂宋本书录》云:“盖南渡之后,文禁大开,苏氏父子之文字为一时所矜尚,坊肆争相编刻以谋锥刀之利,有所谓《三苏文粹》者,最为流行,其后又有‘重广’‘分门’之辑,益趋芜陋。此盖不满于其所为,而别树一帜者也。东莱久负盛名,坊间刊本每相重引,以增声价……以意推之,此亦必托名之作,而非真出吕氏之手。”^[14]近年来,学界则多倾向于该书确系吕祖谦所编选。黄灵庚先生在《吕祖谦全集》所收《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点校说明》中说:“此选本究出于何人,不可详知。观其选文之标准及其所选之文章之内容,则颇注重论道、论史、阐发儒家道学之旨者,而于正面涉及释、老内容以及舒畅性情、描述女色之什皆一概排斥不录,盖视三苏文章之学与孔孟、韩柳、二程互为声气者,则当出自吕祖谦之手……盖祖谦所自为选编、自为标注者。”^{[13]第11册,1}其后杜海军教授又有进一步的论证,主要证据有二:其一,《宝礼堂宋本书录》集部著录《东莱标注老泉先生文集》时说:“此为选节苏老

泉文,前后无序、跋、目录,首行题‘苏老泉先生文集’,次题‘东莱吕祖谦伯恭编注’‘若峰吴炎济之校勘’二行。”^[14]其二,吴炎最早刊刻此书,并述《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成书过程云:“先生父子(三苏)文体不同,世多混乱无别。书肆久亡善本,前后编节刊行,非繁简失宜,则取舍不当,鱼鲁亥豕,无所是正,观者病焉。倾在上庠,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皆可颂习为矜式者,因与同舍校勘讹谬,拟为三集,逐篇指摘关键、标题,以发明主意。其有事迹隐晦,又从而注释之,诚使一见,本末不遗,义理昭晰,岂曰小补之哉……绍熙癸丑八月既望,从事郎、桂阳军军学教授吴炎济之咨。”^[15]¹⁵²⁻¹⁵³刊刻此书是在绍熙四年(1193),而吴炎乃绍熙元年进士,上距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离世不足十年^[16]。其后,李建军教授^[17]、王永波研究员也都赞同此说^[18],并有所补充。

不过,细绎吴炎所述,恐怕事实并非全是如此。吴炎虽然说旧“得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但校勘、分集、指摘关键、标题、发明主意、注释等等主体工作,似乎主要是其与“同舍”共同完成的。并且,吴炎并没有说那五百余篇手抄稿是吕祖谦为专意编选三苏文集而成的,他们只是在吕祖谦手抄稿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标注等等工作,《标注三苏文集》的成书其实并非吕祖谦所知。书坊题为“东莱吕祖谦伯恭编注”,显然是为了张大其目。吕祖谦家世显赫,忠厚谦和,才高学博,又于隆兴元年(1163)连中进士和博学宏词科,极为引人瞩目。吕祖谦其后于乾道五年(1169)除太学博士,乾道八年为省试考官,淳熙五年(1178)为殿试考官,于陈傅良、蔡幼学、叶适、陆九龄、陆九渊等等名士都有识拔之恩,又曾数次开学授徒,不管是学术思想上还是科场风气上,吕祖谦在当时都影响极大。也因此,托名吕祖谦的著作不少,何况该书确与吕祖谦有所渊源,则更不容轻轻放过了。

那么,如果吴炎所云不诬,吕祖谦为何要手抄三苏文集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其编辑《宋文鉴》有关。据《吕祖谦年谱》^[13]第1册,746-748、吕祖谦之弟吕祖俭之子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19]²¹¹⁷⁻²¹¹⁸,吕祖谦于淳熙四年十一月被旨校正《文海》(书成后赐名《皇朝文鉴》,即《宋文鉴》),吕祖谦“即关秘书集库所藏,及因昔所记忆,访求于外,所得文集凡八百家,搜捡编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书乃克成”,但“未及上,而属疾”,其后缮写誊抄,至淳熙六年正月将该书缴申三省以进。吴炎所云“吕东莱手抄凡五百余篇”,或即吕乔年所说吕祖谦收“得文集凡八百家,搜捡编集,手不停披”中流散出来的一部分。但是,吕祖谦手抄三苏文集,本非为了编辑三苏选本,而是为了编辑《宋文鉴》。在抄写、编辑的过程中,吕祖谦“手不停披”,也即在这些手抄稿上已经顺便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标注工作。总之,吴炎等人确实是以吕祖谦手抄、批注的《三苏文粹》稿件为基础,而最终完成《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

但是,这部以三苏选本为目的的《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应是吕祖谦身后才完成的,也非吕祖谦之意。由于徽宗时期屡禁苏氏文字,南宋初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的三苏文集的版本,吕祖谦采用《三苏先生文粹》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吕祖谦应该并不盲信坊间流传的这些版本。吕祖谦说其伯祖吕本中“躬受中原文献之传”^[13]第1册,133,而到淳熙时期,大概再没有人比他更为熟悉北宋人的文集了,所以宋孝宗与臣僚讨论校正《文海》的人选时,王淮便说“非秘书郎吕祖谦不可”,这也得到宋孝宗的首肯^[19]²¹¹⁷。吕祖谦既尊崇苏氏,还因此而招致朱熹、张栻的批评,他也尊崇洛学,并着手刊刻过二程《遗书》、文集、程颐《易传》。其《与朱元晦》其六云:“婺本《易传》,纳三本去,不敢加装治。误字皆已改,但卦画粗细、行数疏密之类,不能如人意悉厘正耳。《遗书》建本未到,已用去冬所寄本刊板,故其间一两段更易次序处,姑仍其旧,余皆以建本为正,闻旦夕亦毕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当令婺人刊之。”^[13]第1册,402所谓《遗书》,即朱熹整理刊刻的《河南程氏遗书》。因此,如果是精熟北宋文献的吕祖谦亲手编选苏轼或三苏文字,像《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这种纂入苏轼名下的二程文字,以及可能见于《斜川集》中的《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吕祖谦是不可能选入其中的。

综上所述,今本《苏轼文集·史评》中所收的《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是改编自二程之语。《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可能也并非苏轼所作,而是其子苏过的作品。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而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历代世变》《韩愈优于扬雄》和《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这三篇文字,但是,吕祖谦曾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该不至于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之中,所以该书应该不是吕祖谦专

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从吴炎所说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文字初稿似乎来自于吕祖谦的手抄稿,并且吕祖谦已经做过初步的标注工作,这应是其编辑《宋文鉴》时所抄、批,颇具文献价值。但是,吕祖谦的目的本非是为了编辑三苏文集的选本,尽管这确实是经其筛选、标注过的三苏文字,而《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指摘关键、标题、发明主意、注释等等后续工作,也并非全部出自吕祖谦之手。

[参 考 文 献]

- [1] 沈松勤. 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J]. 文学评论, 2005(2).
- [2]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程颢, 程颐. 二程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 粟品孝.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J]. 四川大学学报, 2003(4).
- [5] 马其昶.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6] 曾枣庄. 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7.
- [7] 舒大刚, 蒋介宗许, 李家生, 李良生. 斜川集校注[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6.
- [8] 朱熹. 朱子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0.
- [9] 余允文. 尊孟续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0] 安平秋, 郝平.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1] 三苏先生文粹[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 [12] 尹焞. 和靖尹先生文集[M]. 宋集珍本丛刊本, 北京: 线装书局, 2004.
- [13]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 [14] 潘宗周, 张元济. 宝礼堂宋本书录[M]. 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刊印社影印本, 1984.
- [15] 祝尚书. 宋人总集叙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6] 杜海军. 《东莱标注颍滨先生文集》对苏辙文的辑佚与校勘价值[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9(3).
- [17] 李建军. 《三苏文集》与南宋三苏选本[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1(9).
- [18] 王永波. 宋人对三苏文章的选编与刊刻[J]. 铜仁学院学报, 2020(1).
- [19] 吕祖谦. 宋文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Two Forged Literature Works in the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Noted by Dong-lai and Lv Zuqian

Guo Tian

(Advanced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Review* and *Han Yu better than Yang Xiong* both originated from the words of Cheng Hao or Cheng Yi. *Critique of Li Jing and Li Ji* maybe written by Su Guo. These three literatures are all not written by Su Shi. These errors originated from the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Noted by Donglai continued to collect these three forged literatures. Lv Zuqian had printed the words of Cheng Hao and Cheng Yi, he should identify these errors. Therefore,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Noted by Donglai is not completed by Lv Zuqian. However, the formation of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Noted by Donglai was based on the manuscripts, which Lv Zuqian wrote to edit *Warnings of Song Dynasty Prose* (*Song Wen Jian*).

Keywords: Su Shi;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Critique of Li Jing and Li Ji*; *Han Yu better than Yang Xiong*; Cheng Hao and Cheng Yi; *Anthology of the Three Su* Noted by Donglai; Lv Zuqian

[责任编辑: 刘力]